

文化叙事的风格化与多样化

——《白鹿原》与《敦煌·六千大地或者更远》的一种比较性研究

赵录旺

(陕西教育学院 中文系 陕西西安 710061)

摘要 小说写作本质上作为一种文化叙事是以文化语境为基础的对生活的象征性表达。叙述中展开的文化语境和作家的创作个性形成小说叙事的风格化和多样化的基础,并形成小说叙事的美学境界。以文化叙事理论为基础,在对《白鹿原》与《敦煌·六千大地或者更远》的比较性研究中,阐释两部作品鲜明的风格差异,从而对文化叙事风格化和多样化的审美追求展开具体而深入的思考,以期对文化叙事理论有更深入的理解。

关键词 文化叙事;风格化;陈忠实;冯玉雷

中图分类号 I207.42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9020(2009)06-005-04

—

小说是一种叙事艺术,其叙述的基础是叙事的文化语境,因而本质上是一种文化叙事。那么,如何理解文化叙事呢?首先,我们要对文学叙事行为进行简单的探讨。简而言之,叙事就是讲故事,就是用话语虚构社会生活事件。文学叙事作为一种虚构本质而言是对生活的一种象征性的表达,这一表达包括了两个层面的内容:一是作为表层结构发生的故事内容本身,一是作为深层结构的意识形态及文化内涵。表层结构和深层结构彼此奠基,共同形成文学叙述话语的内容。从广义上来讲,文化内在的制约着文学叙事的进行,形成文学叙事的基本的意义逻辑,因而文学叙事本质上是一种文化叙事。

文化对文学叙事的制约作用体现在叙事发生的文化语境,任何叙事的发生都是在特定的文化语境中进行,因而对人物的塑造、对生活的理解、对意义的阐释等都是文化为基础的,文化作为价值体系和意义规范成为文化人理解自我和世界的根基,也成为故事内容和人物性格刻画的内在规范。小说叙事作为虚构性的话语活动,奠基于叙事的基本语境。一般而言,叙述的语境包括文本语境和文化语境,叙述话语的意义产生于文本语境和文化语境之中,特别是受制于叙述发生的文化语境。何谓语境?语境就是话语叙述的上下文关系,即话语行为的意义关联域。只有在特定的上下文中语言的意义才是可理解、可阐释的。文本语境,指的是文本叙述中文本本身

所形成的上下文的意义关系;文化语境,指的是叙述所发生的特定的社会文化意义关联域,是以社会的文化心理、意识形态观念等为基础的叙述的更大的上下文的意义关系。文化语境为文本语境和文本叙述的虚构进行意义奠基,并成为理解文本故事的基本意义根据。因而阐释小说叙事的文化内蕴的核心是对叙事发生的文化语境的理解。

但另一方面,小说叙事作为象征性话语并不是文化观念的直接表达,而是以人的生命体验和生活状态为基础的一种系统性的象征性话语活动,作为象征性话语在以文学话语为基础的写作和对话中文学文本当然就具有了多义性、多解性和歧义性,甚至悖论性等意义特征,因而文学叙事作为文化叙事对文化的阐释就有某种解构、反思和批判的思想自由,使文学的文化叙事形成一种内在的意义张力,这对文化的意义、对作家和读者的文化心理等都具有解构性的解放意义。由此,文学叙事作为话语性的审美创造,在文化语境的奠基中赋予作家创作和阐释的极大自由性,使作品在叙事中展开为不断生成的具有启思性的意义世界,不断地在现实生存语境中阐释和开拓文化的新的现实意义,作家的文化叙事也成为现实社会中自由的文化创造的一种重要方式。

因而,从文学叙事的根本性特点来看,文学叙事深受叙述的文化语境和作为叙述者的作家个性的制约。由于作家叙事中具有的自由创造性本质和文化语境本身的多元化特征,形成了文化叙事在不同的

收稿日期 2009-09-11

作者简介 赵录旺(1969—),男,陕西富平人,副教授,文学博士。研究方向:文艺学。

作家那里体现出多样化和风格化的审美特征的基础。因而要全面深入地理解文化叙事就应对叙事的风格化和多样化加以把握,才能真正对小说作为文化叙事的特征加以全面深入的思考。

什么是风格?一般而言,“风格是指作家创作个性在文学作品的有机整体中通过语言结构所显示出来的、能引起读者持久审美享受的艺术独创性。”^[1]也就是说,风格首先体现了作家创作的独创性,它是作家的创作成熟的标志。其次,风格体现的是作家的艺术个性,所谓“风格如人”,即它是作家内在的个性气质、艺术情趣、审美追求和文学才能等的集中体现。再次,作家的这一创作个性最后通过文学文本的话语叙述表现出来,文本存在形态是作家创作个性外化的结果。刘勰在《文心雕龙·体性》中讲到:“夫情动而言形,理发而文见,盖沿隐以至显,因内而符外者也。”^[2]因此,要把握文学叙事的风格还是要从文本出发,在对文本叙事的独特性的理解和阐释中把握和理解作家的创作个性和风格化特征。

由于风格是一个作家文本叙事中形成的个性化审美特征的表现,因而对一个作家的风格进行把握的最好方式就是展开一种比较性的研究,在比较中,作家的创作个性及其作品的美学风格就显现出来。本文选取了同属西部的两位作家陈忠实和冯玉雷的作品进行比较性研究。这两部作品都具有文化反思和文化寻根的审美意向,都是对历史和现实进行了一种深度追问和精神体验,各自具有鲜明的风格。本文试图通过对陈忠实的小说《白鹿原》^[3]和冯玉雷的小说《六千大地或者更远》^[4]这两部风格迥异的作品比较性研究,来阐释文学叙事多样化和风格化的艺术特征,从而把握文化叙事作为话语虚构的社会生活的象征性表达所具有的自由创造性和精神超越性的美学品质和文化意义。

下面我们从文化叙事的理论角度对两位同是西部的作家展开一种比较,一方面试图把握两位作家对比鲜明的风格特征,另一方面更进一步把握文学叙事作为自由的审美创造在艺术上展现的风格化追求。

二

如果我们从陈忠实和冯玉雷两位作家小说写作中文化叙事的异同来加以比较,则可以看出,文化叙事作为一种艺术创造应该是一种多样化的自由的审美创造。在叙事中,作者可以自由吸收和运用多种叙述手法和叙述策略,在不同的语境中展开自由写作,并形成作品叙事不同的风格化追求,因此文化叙事是一种富有生命力的开放自由的文学写作活动,

对作家的写作提供了广阔的艺术创造空间。在此我们试图通过对两部作品的文化叙事艺术的简单对比,在区别性的思考中把握两部作品的风格。

首先,从两部作品的文化叙事中形成的文化语境来看,两部作品所展现的文化世界的思想情趣和审美意向很不相同,由此形成不同的审美文化世界。冯玉雷的《六千大地或者更远》以敦煌为写作背景,围绕西方世界对敦煌艺术文物的大发现而展开的文化探险为叙述内容,随着西方考古者的脚步展开西部广袤的地域中形成的多元文化和谐共融的意义世界。西方世界文化探险者的到来,既打破了西部平和宁静、天地人和谐共生的生存状态,同时也揭开了西部包容并蓄、情韵独特的多元文化共生的精神世界。在这一世界里,作者叙述了佛教文化、道教文化、儒家文化以及西部独有的异域文化等多元文化语境中人的精神境界、生存状态和生活命运,在天高地阔、地貌多变、景象雄奇的西部天地表现人的灵魂,展开形而上意义的哲性思考,并和西方文化展开历史性的交流和对话,由此形成作品儒释道共在、东西文化互生、气势雄奇的西部地域独特的文化叙述语境。

和《六千大地或者更远》不同,《白鹿原》写作的文化语境则是以儒家文化为主的传统文化语境,作者写的是清风明月、河山秀丽的关中大地上的一个小小村落,这个小村落在历史变迁的冲击下,人们的生活在社会变迁的动荡中飘摇沉浮。作者描写的地域场景没有前者的广远和多样,因而不是追求叙述中跳跃动荡的气势之美,而是在这小小的一隅,不断地向生存者的灵魂深处开采,在寻根式的精神还原中,揭示传统文化语境中中国百姓在现实性、历史性生存中的命运,从文化心理和生存境遇等多方面揭示人之生存的悲剧性命运的文化根源,对在传统文化语境中人性深处演绎着的情与理的激烈冲突展开了细腻描写和深度叙述。在这一深度叙事中,作者以小小的村落映照一个社会大变革的时代精神,展开各色人等在社会变迁带来的生存境遇的变化中,在东西文化碰撞的双重道德的对立冲突中,人的心灵深处展开的对母体文化背叛与回归的艰辛和痛苦,因而整个作品形成一种以文化冲突、情理冲突等为核心的悲剧性美学境界。

总之,由于作者叙事的文化语境的差异,以及这一文化语境在作品中展现的具体生活场景的差异,以及作家在叙述中对待文化的艺术态度的不同,从文化语境这一叙事的起点和基础而言,作家的风格就出现了很大的差异。

其次,由于作品叙述中文化语境的差异,以文化语境为基础的故事叙述就会很不相同。因而,两部作品在故事的叙述中情节的展开方式,以及故事叙述中隐含的审美意向就极不相同,形成风格差异化的基础。在《六千大地或者更远》的故事叙述中,作者以多元化的文化语境为基础,采取了多角化的叙事视角,故事情节大起大落,跳跃变化,灵活多样,从某种意义上,作者的意志控制了情节的进程和发展,故事叙述成为了作家思想自由创造的场域,作者常常使情节处于碎裂状态,在情节的交错共生中展开丰富的意象,而且常常在一种荒诞性情节的制造中传达某种象征性的哲理,因此作者的叙事体现出现代主义乃至后现代主义艺术家把写作视为个人主义书写方式的观念,文学作品的叙事成为个人化的自由书写。

而《白鹿原》的故事叙述与此极不相同,作者在故事的叙述中,以传统文化为基本叙述语境,以白家轩等人代表的白鹿村的百姓生活为主线,以黑娃、鹿兆鹏等人代表的社会革命活动为副线,形成主次分明、互相映照、时分时合的故事结构。在这一主次不同的文化世界形成的反讽性式的叙事语境中,在乡村社会的传统文化和新文化的价值意义的对立与冲突中,作者展开人物的生活故事和生存命运的叙事,情节开合有度、故事叙述逻辑严密,在故事的讲述中追求历史真实和生活真实,进而从文化心理入手深入人物的精神世界,因而叙事中故事的发生情理细密,既符合生活的逻辑,也符合情感逻辑。因此《白鹿原》的叙事是典型的现实主义的史诗,是作者对现实中的人灵魂之中所发生故事的细致入微的讲述,这一讲述既是审美性的情感表现,也是反思性的思想阐释。因而,其故事的讲述不是简单的表层叙事,而是深层的心理现实的艺术再现。

再次,由于叙述的文化语境的差异,作者采取的叙述方式、写作理念以及审美意向的差异,两部作品在丰富的人物形象的塑造中也大不相同,形成各自鲜明的风格。《六千大地或者更远》在对人物的刻画中,大多是一种粗线条的勾勒,不求细腻描写,而是从精神上把握人物的神韵。作者在作品叙述中塑造的丰富的人物形象,常常在诗情画意的描写中见出人物的性灵之美,而同时又以不同的方式把人物形象的言形举止推向荒诞离奇,从而使人物具有了象征性,以传达一种异域文化的粗犷之美和哲理性的思想隐喻。如作品中的楼兰姑娘、香音以及众多的穿行沙海的骆驼客,甚至包括斯文的西方考古者都是如此。因此,作者写人物,常常是以神遇而不以目视,人物在离奇的行

为中象征性的表达作者的思想,因而是性灵中见哲理。这是其塑造人物形象的重要艺术风格。

《白鹿原》的写作中,作者对人物的塑造坚持的是一种细腻温婉、深刻独到的典型化创作方法。在人物的刻画中,他以活生生的现实生活为基础,在对历史的深刻思考中,从人物的文化心理和生活境遇出发,刻画人物的精神气质、性格特点,从人性深处揭示人物在其生存中精神世界的矛盾冲突,人物写得活灵活现,让人感同身受,如见其人。特别是,作者从对人物的文化心理的把握出发,展开对人物无意识世界的描写,精微细腻,而且对人物在无意识世界展开的情理冲突中心理的发展变化及其形成的内在动因和发展变化的节奏等的描写,更是十分的精彩。如作品中对田小娥、大姐、鹿三等众多人物心理的描写等,作者都是刻画得入情入理,而且对其情理发展的节奏的掌握,火候十分精到,从一个个人物的命运中揭示出我们民族心灵深处的集体无意识。总之,作者刻画人物,于性灵中见沉重,在对人物至性至灵的情化描写中写出人的生存悲剧,从而达到对历史、文化和现实的精神反思及文化反思的审美意义。

再次,由于作品的文化语境、作家的文化心态、创作态度以及故事叙述和人物塑造中体现的审美意向等的差异,作为作家审美精神的物态化的产物的文本语言,自然形成不同的风格。两位作家作为个性不同的创作者,在文本写作中形成的语言风格也自然是各具特色。比较而言,两部作品的语言都是深刻凝重中具有一份幽默的情趣,但在这一幽默厚重中却有很大不同。《六千大地或者更远》的语言在幽默中见荒诞,甚至在一种离奇的调侃式的象征性叙述中揭示人物的文化心理和地域性的精神气质,从中见出西部人一种天性活泼的想象力和执着豪放的性格特征,当然这也是作者自身象征性创作思维的有力体现。而《白鹿原》的语言在幽默中见出悲凉,他在幽默中以陕西本色化的地方语言描写人物的心理和命运,与人物的现实生存状态和心理状态相契合,十分符合人物在其生存的文化环境中的身份和地位。作者在幽默调笑的叙事中,往往是以反讽的语言揭示人物可怜的生存处境,在幽默的笑中让你落泪,所以他的幽默常常是一种反讽式的悲剧性言说方式。读他的作品,诗意中有一股泥土的气息,幽默中有一种冷峻敏锐的思想,形成独特的语言风格。

当然,任何作品的语言风格是作家审美情感和艺术追求的全面体现,因而应该具有多方面的特点。在此我们只是试图把握《六千大地或者更远》和《白

《白鹿原》语言所具有的不同个性,因而在此只是简单地加以对比,而不试图作一全面分析。

以上我们简单地对比分析了两部作品的风格特征,从中可以看出,在两部作品写作中展开的文化叙事中,从不同层面和不同深度体现出两位作家极不相同的创作个性,因而两部作品从思想、情韵和格调等方面表现出极大的差异,形成作品各具个性的鲜明风格。在比较中我们对他们文化叙事的风格可以简单地概括为:《六千大地或者更远》表现为一种粗犷任性,哲思深远,富有奇情异趣而又不乏荒诞诙谐的美学风格;《白鹿原》则表现为一种温婉凝重,情理细密,具有生活的厚重感和历史的沧桑感,并且在语言的幽默中见灵性的悲剧性美学风格。

三

以上我们把青年作家冯玉雷的作品《六千大地或者更远》和陈忠实的《白鹿原》进行了多角度的比较性思考,以把握文学叙事所追求的风格化和多样化的创作自由,把握两位作家在文化叙事的审美创造中所形成的各自的独特风格。和陈忠实一样,冯玉雷也是一位西部作家,有评论家把他的写作也归为一种独特的文化寻根,不过他的寻根的文化语境和生存语境与陈忠实的写作处境是很不相同的。这里把二人放在一起对比,一方面是为了能够在对比中把握两部作品写作中形成的风格化特征,理解两部作品所展现的审美境界,避免对风格把握仅仅停留在抽象概括层面,试图在对比的差异中感受作品风格特征的美学意义。这里必须强调的是,在此比较中绝对没有谁优谁劣的比较和判断,只是强调文化叙事作为艺术创造的风格化追求的重要意义。另

一方面,这一对比也是为了对小说写作的文化叙事获得一种更为普遍化的理论思考,说明叙述语境特别是叙事的文化语境对于小说叙事作为审美创造的奠基意义。任何作家的艺术叙事都离不开文化语境,在作家的思想个性和文化精神的对话中,艺术创造在对现实的叙事中才能达到一定的深度,并形成自己的美学境界和美学风格。因而,文学叙事首先是文化的,文化赋予了作家的叙事以个性特征和深厚意蕴。

从两位作家创作风格的比较我们也可以看出,小说写作中的文化叙事的风格在不同作家的创作中表现出极大的差异性,这正是文学作为自由的审美创造,自身对风格的多样化追求的体现。这一多样化的基础是作家艺术个性的多样化的结果,而作家艺术个性的形成,除了受本人的个人气质影响之外,更多的要受到作家写作时面对的文化环境、地域特色、民族文化以及作家受到的文学理念等的影响,而其集中表现则是作品写作中体现的文化语境,文化语境制约着作家的叙事,是作家叙事的情理和事理基础。两位作家的写作,深刻而鲜明地体现了文学叙事作为文化叙事的风格化美学特点。

参考文献:

- [1]童庆炳.文学理论教程[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2.
- [2]王运熙,顾易生.中国文学批评通史(第二卷)[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440.
- [3]陈忠实.白鹿原[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
- [4]冯玉雷.敦煌·六千大地或者更远[M].北京:作家出版社,2006.
- [5]赵录旺.叙述与超越[J].西北成人教育学报,2007(4).
- [6]赵录旺.面向家园的守护与召唤[J].小说评论,2008(2).

The Stylization and Diversification of Cultural Narration A Comparative Research on Bailuyuan and Dunhuang

ZHAO Lu-wang

(Department of Chinese, Shanxi Institute of Education, Xi'an Shanxi 710061)

Abstract: The composition of novels is, by nature, a symbolic reproduction of the real life based on certain cultural context. The cultural context unfolded along with the narration and the writer's personality in composition can determine the basis of one novel's style and cultural diversity, and they further form the aesthetics of the novel's narration. Started from the introduction of Cultural Narration theory, this paper attempts to dig further in terms of the comprehension of the stylization and diversification of Cultural Narration by presenting the author's comparative research of two modern novels: Bailuyuan and Dunhuang.

Key words: cultural narration; stylization; Chen Zhongshi; Feng Yulei

责任编辑 蒋德璋